

ZHONGGUOGUD

AIZHIXUEMINGZHUQUANYICONGSHU

子译

墨全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译丛书

建国以来首次集中了儒、释、道三家精华的译文

孙以楷

甄长松

译注

全

己 蜀 书



孙以楷·译注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墨子全译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全译/孙以楷,甄长松译. —成都:巴蜀书社,
2000.10

(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ISBN 7-80659-128-1

I. 墨... II. ①孙...②甄... III. ①墨翟-译
文②墨家 IV. B2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0633号

责任编辑 周田青
封面设计 张光明

墨子全译

孙以楷 甄长松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武侯区机投镇潮音工业小区(028) 7445573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字数 300 千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59-128-1/B·23

定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任 继 愈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方立天	孔 繁	任继愈	牟钟鉴
杜继文	何兆武	余敦康	杨宗义
庞 朴	冒怀辛	段文桂	段志洪
阎 韬	萧萐父	黄 葵	楼宇烈

执行编委

黄小石

总 序

任 继 愈

在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统一方针指导下，我们与巴蜀书社合作，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它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伟大的贡献，有赖于民族思想文化的成熟。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忧患和灾难。但是，忧患和灾难并未使它消沉，反而使它磨炼得更加坚强，在与困难和挫折的斗争中，它发展了、前进了。在前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认识着世界，改造着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身。

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其深奥的内容，明睿的智慧，在古代社会，和其他民族相比，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国哲学，在当时，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在今天，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随着对历史的深入剖析，中国哲学的内容和它的价值，将日益被更广大的人群所认识、所接受。

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有责任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要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和新的精神文明，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求借鉴，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是个必要的途径。

借鉴中国古代哲学，广大读者首先遇到的麻烦，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本丛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扫除这个障碍，使得更多的人能从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中得到启迪，锤炼他们的智慧。

汲取前人的文化财富（包括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都应该直接取自原作，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事实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总是少数人。所以从古到今，都有一些人在从事翻译。有不同文字的互译，也有古籍今译。缺少这个工作，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就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的财富。

古文今译，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曾把商周的文献典籍译成当时流行的语言，树立了成功的范例，使诘屈聱牙的古代文献，被后世更多的读者所理解。古希腊哲学为后世欧洲哲学的源头，今天的欧洲人（包括今天的雅典人）了解古希腊哲学，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古希腊文原著，人们多是通过各自民族的现代译文，去了解古希腊哲学，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任何译作（古文今译，异国语文互译）都难作到毫毛不走样。但我们要求本丛书的译文，除了对原文忠实外，还要尽力保持原著的神韵风格。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并希望以此和广大读者共勉。

《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

凡 例

一、本丛书是学术性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全译丛书。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译本即可直接承继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使国外读者可直接依据今译本译成外文，以利中外文化交流。

二、本丛书主要供专业工作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以适应中国文化研究向深层发展的需要。

三、本丛书选取中国古代著名的，较为难读、又较为完整的哲学论著分批进行今译。第一批选题二十四种。

四、本丛书每一译本均吸收古今各家成果，忠于原著精神，突出哲学思想。

五、本丛书每一译本均分为译文、原文两部分，译文用现代简化字，原文用繁体字。

译文前均有一篇较长的研究性述评，文中各篇均有题解。

译文部分附必要的注释，原文部分附必要的校勘。

六、今译是本丛书的主体部分，译文尽量做到信、达、雅，要准确信实译出原意，要用精确、流畅、规范的现代汉语表达出

原著的哲学思想，力求体现原著风格和艺术韵味。不拘于直译、硬译。

七、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一般在译文确实无法传达原著哲学思想，或古代语辞确实无法译成现代汉语时，加注释。

注释在充分领会前人成果基础上，断以己意，力求简明扼要，避免繁琐罗列。但有价值的不同意见，必须列出。

注释一般用脚注。

八、校勘体例仿照《二十四史》校点本。本丛书每一种书所依据的底本，尽量选用业经整理的较好版本。

九、本丛书每一译本一般附以哲学范畴、命题索引和参考书目索引。根据具体情况，或设或不设人名、书名索引。

哲学范畴、命题索引以原文为主。

前 言

《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

墨子名翟（约公元前 470—前 381），一说为鲁人，一说为宋人。实际上，其先祖为宋国公族目夷氏（墨台氏），后在宋国内争中失败，迁往小邾国，遂为鲁之附庸小邾国人（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至墨翟，已降为贱人。墨翟少时曾为木工，工於器械制造。他曾学于儒家，不满于儒家的崇信天命、繁文缛礼、尚乐厚葬以及有差等的爱，遂自立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曾为宋大夫。主要从事讲学授徒和政治活动，常往来于鲁、齐、宋、楚诸国。他创建和领导了墨者集团，为首任巨子。其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捐作团体的基金。他们生活俭朴，纪律严格，富于牺牲精神但往往热情盲从：“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伏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

《汉书·艺文志》墨家类著录“《墨子》七十一篇”，无卷数。《隋志·经籍志》、《归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墨子》十五卷”。《宋馆阁书目》著录：“《墨

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比《汉书·艺文志》著录已遗失十篇。蒋伯潜说：“《宋馆阁书目》云：‘亡九篇’。七十一篇亡其九，当为六十二篇，而作‘六十一篇’者，疑‘一’字为‘二’字之误也。”亦备一说。今本《墨子》仅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宋以前亡十篇，宋代亡八篇，共亡十八篇。佚失十八篇中有目可察者为：《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等八篇。据孙诒让考证，亡佚篇目还有：第五十四篇疑为《备钩》、第五十五篇疑为《备冲》，第五十七篇疑为《备堙》，《备犢轡》、《备轩车》两篇疑当在第六十四篇及次篇位置。《备空洞》一篇与《备穴》、《备突》次第窜乱，亦为佚篇。还有四篇佚文，篇名不可考。

作为墨家著作总集，各篇作者不一，写成的时间、体裁、内容亦有别。现存五十三篇可以分为五组。第一、今本《墨子》第一篇至第七篇，即《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等七篇。梁启超认为“《亲士》、《修身》、《所染》三篇，非墨家言，纯出伪托”，也有人认为上述几篇观点与儒家不同，当是墨家后学作品。实际上，前两篇带有一定儒家思想色彩，正是墨子学于儒家的印记。而其基本观点又不同于儒家，正是墨子脱离儒家后自成学派的最早作品。《亲士》、《修身》无“子墨子言曰”，亦为墨子自著之佐证。《亲士》所言吴起之裂，非墨子所不及见，因此不能据以证明《亲士》非墨子自著。《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是墨子思想的纲要，其体裁为问答记录体，无《论语》零散之失，类似《孟子》七篇，当为墨子弟子在墨子逝世后据记录增益而成。这五篇记录不分上、中、下，可以推知此时墨子弟子尚少，可视为墨子中年

时期的讲学记录。第二、今本《墨子》第八篇至第三十九篇，其间缺八篇，尚存二十四篇，问答记录体，共十一个题目，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除《非儒》外，各篇均以“子墨子曰”开篇，正是墨子讲学，弟子记录，以后由墨子弟子根据记录整理而成。墨子逝世后，墨家分为三派。《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庄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背诃不同，相谓‘别墨’”。“相里氏之墨”，即“相里勤之墨”，“邓陵氏之墨”即“南方之墨……邓陵子之属”，惟“相夫氏之墨”与“五侯之徒”说法不同。但墨分三派之说则一。墨学三派各以自己一派的记录作为传授教材，在编纂总集时这十一个题目均各有上、中、下三篇，即三派的记录均被收入。也有人认为上、中、下三篇是墨子及其弟子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它标志着墨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这二十四篇仍保留问答记录体的形式，但已经以义命题，成书于孟子时代。《非儒》已由问答体发展为设问驳难体，且无“子墨子曰”，可能是墨子弟子所撰，当成书于儒墨斗争十分激烈的战国中期，但仍应在孟子成名之前。这二十四篇集中了早期墨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和经济思想。是研究墨子和早期墨家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

第三、今本《墨子》第四十篇到第四十五篇，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这六篇一般称为《墨经》。梁启超认为“《经》上、下，当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当是述墨子口说，但有后学增补；《大取》、《小取》，当是后学自著。”（《墨子学案》）但是，这六篇的主体是名

学，名辩思潮兴于战国中后期，六篇中对离坚白、合同异两派的命题均有批评，因此它们不可能写成于公孙龙与惠施之前。六篇中所涉及的认识论、自然科学问题所达到的水平，是墨子时代所不可能达到的。六篇中涉及天志仅一见，这与墨子倡扬天志、明鬼明显区别。它表明后期墨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抛弃宗教神学，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所谓“经”，并非经典之意，而是指精练的命题，“说”是对“经”的训释，可见六篇体裁为训诂体，形成较晚。根据以上理由，一般认为《墨经》六篇是战国后期的作品，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第四、今本《墨子》第四十六篇至第五十篇，即《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五篇，是墨子弟子关于墨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记录。每篇皆取首二句中之二字为题，近似《论语》，当撰成于《论语》之后，《孟子》之前，可能早于本书《尚贤》等二十四篇，是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可靠史料。第五、今本《墨子》第五十二篇至第七十一篇，即《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中间缺第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等九篇。这十一篇是墨子讲授防御战术与守城工具的著作，由禽滑釐及其弟子据记录整理而成。观其或称“禽滑釐”，或称“禽子”，推知《备城门》篇可能写成于墨子晚年，其它诸篇写成于禽滑釐时代。有人据《号令》、《杂守》中杂有汉代官名与刑法制度，疑为汉代人编撰。对此，孙诒让有所驳正，甚是。

全书五个部分，最早写成于墨子晚年，最晚写成于战国后期。《墨子》七十一篇，由汉代刘向校定，著于《别录》，为刘歆

《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因。

《墨子》版本可分为无注本与有注本两大类。一、无注本。《墨子》十五卷，有《道藏》本，明唐尧臣刻本（以后有《四部丛刊》影印本），明末堂策槛刊本、《四库全书》抄本。《墨子》六卷，明万历涵春楼刊本。《墨子》四卷，明万历縣眇阁刊《先秦诸子合编》本。二、注本。《墨子注》十五卷，清毕沅校注。主要有清乾隆《经训堂丛书》本，光绪《二十二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毕氏此书是二千年来第一次对《墨子》全书所作的校注和整理，但校注过简，误校误释较多。《墨子间诂》十五卷，目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清末孙诒让撰。有上海图书馆藏孙诒让手稿本，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光绪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宣统庚戌重定本（以后有涵芬楼影印本），1954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国学基本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1986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孙氏以毕本为底本，以明刊道藏本、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宝历间仿刻明茅坤本相校，同时吸取了王念孙、王引之、洪颐煊、俞曲园、戴望诸家成果，集诸家之大成。俞曲园在《墨子间诂序》中指出：“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辄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归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以后张纯一的《墨子集解》、《墨子间诂笺》、李笠的《墨子间诂校补》、刘再庚的《续墨子间诂》、吴毓江的《墨子校注》，王焕镛的《墨子校释商兑》，均对《墨子间诂》的错漏之处做了补正。台湾李渔叔撰《墨子今注今译》，不收《墨辩》六篇和《城守》

十一篇，是较通俗的译本，其错讹之处也不少。

墨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兼爱，有人认为是非攻，有人认为是尚同，有人认为是功利。我们认为兼爱只是墨子思想的理论根据，“兼相爱”还是为了“交相利”，功利才是墨子一切主张的核心。

（一）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尚贤、尚同、非攻。

（1）尚贤，是主张把贤才之人选拔出来担任要职，高予之爵，厚予之禄，使他们既富且贵。墨子反对世袭制度，指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他特别强调“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很明显，他的尚贤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对政治权利的要求。

所谓贤才，其标准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小生产者渴望得到帮助、得到利益的思想。所以尚贤也还是为了功利。

（2）尚同，是指全国的管理必须统一于君主。墨子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古代人们相互攻击，为了调和相互攻击的各方，就要有能够判断是非的人和机构。于是，人们“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然后又选择有贤才的人为“三公”来辅助天下“同天下之义”。墨子不认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把它看成调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机构，这是小私有者幻想依靠国家保护的表现。但是墨子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国家形成的社会原因，排除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是极其可贵的。

墨子主张尚同，是希望社会安定，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以获得经济利益。尚同的根本也是功利。他认为“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总之，一定要使尚

同有利于天下之人。

(3) 非攻，即反对战争。墨子认为战争给交战双方的人民带来了痛苦，破坏了生产。他说，战争如果在春天进行，则误耕种；在秋天进行，则误收获。打仗要损耗牛马兵刃，死伤众多，“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就是对于战胜国，“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可见，功利仍然是非攻的出发点。

(二) 在社会生活中，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尤其明显地表现了功利思想。

(1) 节用，主要是指反对统治者的奢侈，要求他们节省费用。供统治者挥霍的财富来自“暴夺民衣食之财”，如果奢侈成习，小私有者的财产也难免被剥夺干净。正是从保障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墨子提出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的原则。可见，节用的标准也是小生产者的利益。

(2) 节葬，一方面是反对统治者“多埋赋财富”以及杀殉奴隶，另一方面是破除老百姓中亲死则“久禁从事”这一陋俗。这种厚葬久丧的风俗，对发展生产极为不利，是小生产者肩上十分沉重的负担。

(3) 非乐，墨子认为音乐不能给劳动者带来利益。统治者为了满足对音乐的享受，必将征调许多劳力制造乐器，充当乐手，耽误了这些人的生产。如果老百姓也仿效统治者，都来制造乐器、演奏乐曲的话，那就会妨碍男耕女织。所以非乐的实质也还是功利。

(三) 以兼爱为号召，以交相利为实质的伦理思想。

孔子说“仁者爱人”，墨子把“仁”发展为兼爱。“仁者爱

人”与兼爱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爱有差等”，即爱不是平等的，而是以阶级地位为转移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对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爱的内容方式都有差别。如对劳动者，只是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这不同于爱马、爱宝玩，爱的方式是恭宽惠，对统治阶级内部要实行忠恕原则。二、只有剥削者才能施爱，劳动者是不能反过来施惠于剥削者的。只有君子才能成为仁者，劳动者是不能成为仁者的。三、不同地位的人的施爱都是受到自己地位的限制，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墨子的兼爱是“爱无差等”，是对等的关系，不受等级限制。就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应当是“爱人若爱自身”。大而至于家庭、国家之间，也应该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墨子认为如果都能以兼爱为原则去处理各种关系，那就不会有战争，就会出现父慈子孝、君惠臣忠、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贵不做贱的局面，社会就会安定。其最终结果，当然是有利于生产发展。所以墨子认为兼爱是“天下之大利”。兼相爱必须以交相利为前提，这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希望财力充裕的人给别人以帮助，但反对穷苦者用暴力夺取。这固然表现了小生产者的善良，但也表现了他们的软弱和空想。

（四）倡天志而非命的天道观

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国家的形成，君主以及官吏的任用，自然的一切，都是天志的体现。天志的核心是要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凡是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都会受到天的奖赏；凡是别相恶的人，也必定受到惩罚。战争是违反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所以非攻也是天志的内容之一。凡是墨子主

张的一切，都是天志。天志实际上是墨子所代表的小生产者阶层的意志，天志的核心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天志是墨子手中的工具。墨子说：“我之有天志，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墨子拿了这个规矩“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

在墨子哲学中，小生产者的现实愿望和力量采取了超现实的形式。他所宣扬的鬼神并无可怕的味道，倒是给人一种可亲之感，使人感到天志就是人志。

和传统的天命论迥然不同，墨子是竭力反对命定论的。墨子认为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人的努力与否，没有什么命运。他指出：“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社会治乱取决于统治者的政策：“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个人的贫富温饱也完全由人力决定：“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人的作用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到十分崇高的地位，人力对人的命运具有了决定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从神学到人学发展中的又一突破。

墨子认为“命者暴王所作，富人所述”，这句话是我国历史上对天命论社会根源所做的最早最接近真实的探讨。

（五）注重经验与效用的认识论

墨子的功利思想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注重经验与效用。

一、唯物主义地解决了认识的对象与来源问题。墨子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事物，认识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仪者也。请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他肯定人的认识对象是客观事物，人对事物的认识一定要通过感